

# 古都西安历史上的城市更新模式 与新世纪城市更新战略<sup>\*</sup>

吴宏岐<sup>1</sup> 严 艳<sup>2</sup>

(1.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2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提 要** 本文在简要回顾古都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 研究分析了西安建城 3000 多年来城市更新的主要模式, 认为古都西安的城市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旧城和新城脱开 (新旧分制) 类型、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缩小旧城类型、拓展旧城类型和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等六种城市更新模式, 比当代城市学者根据国内外城市更新现状所总结的城市更新模式要复杂一些, 而西周丰京、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均采取了旧城和新城脱开的城市更新模式。论文还对抗战时期三种城市更新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 最后结合当前古都西安保护与发展的新形势, 提出新旧分制是新世纪西安城市更新的基本战略。

**关键词** 西安 古都保护 城市发展 城市更新模式 城市更新战略

城市发展的历史 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更新、改造的新陈代谢过程。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诸如居住环境恶化、市中心区“衰败”、城市特色消失、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在许多城市都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 因而城市更新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年来, 我国的城市化已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城市更新问题也颇受政府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学界的重视。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是旧城的更新改造, 而各个城市的旧城都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旧城的规模、形态与结构是逐渐发展而来的, 对旧城进行更新改造必须充分考虑其现状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 应与新城的开辟结合起来, 即要贯彻城市整体更新的思路, 才能制定出相应的科学的更新规划。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不过笔者想要强调的是, 现阶段对旧城的更新不仅不能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经验, 而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城市应寻找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更新模式,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应该注意吸取和借鉴。这里拟对古都西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更新模式略作研究, 以期能对我国具有古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类城市, 尤其是新世纪西安本身的城市更新改造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sup>\*</sup> 本研究受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 (人文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教社政〔2000〕9 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00ZDXM770012) 资助。

## 一 古都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

西安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也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sup>①</sup>。西安的城建史发端于西周之丰京,关于周文王都丰的具体年代,史书语焉不详,今人则颇多不同说法。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之先人弃(即后稷)始封于邰,而后公刘徙豳,古公亶父再徙于岐下,文王(西伯)“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周武王立位之“九年”即“东观兵,至于盟津”,兴师伐纣不果而返,“十一年”再伐纣而克商<sup>②</sup>。另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最新研究成果,公元前1046年可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年<sup>③</sup>。这样根据《史记·周本纪》的有关记载,就可推定武王元年则为公元前1059年,文王都丰应在公元前1059年。这就是说,如从公元前1059年周文王都丰算起以迄于今,古都西安的城建史应该有3062年的时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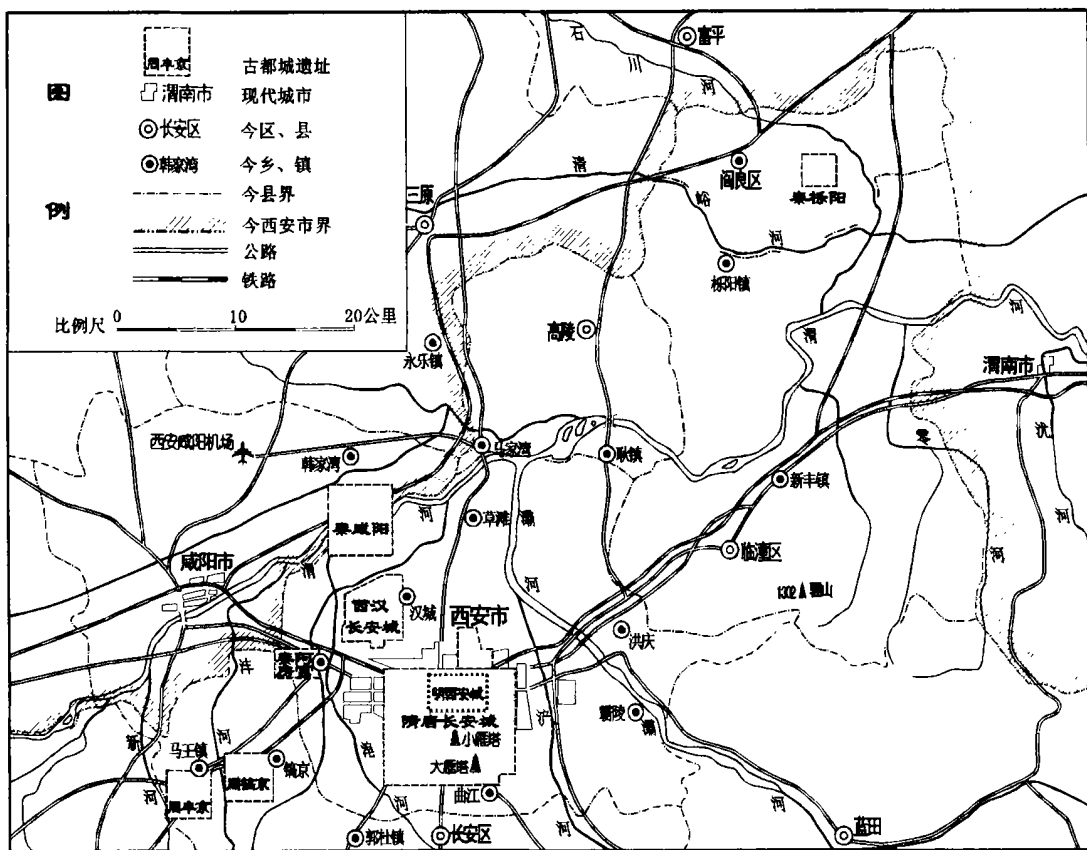


图1 西安地区周秦汉唐都城位置变迁示意图

① 这里所说的中国七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和安阳,世界四大古都指的是中国的西安、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和埃及的开罗。

② 《史记》卷《周本纪》

③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49页。

在古都西安长达 3000 多年的城建史中,以唐昭宗天祐元年(904 年)迁都洛阳为界,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前期可称之为都城发展期,共有 1962 年,从西周以迄于唐,先后为西周、秦、西汉、隋、唐等个 16 王朝或政权的都城,作为都城的时间共有 1133 年<sup>①</sup>,占这一阶段的 58%;后期可称之为西北重镇发展期或后都城发展期,历经唐末、五代、宋、元、明、清、民国以迄于今,共有 1100 年,西安虽然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仍然是中国西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有些时段如元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七大古都中,西安建都朝代之多、建都时间之长均居首位,而且所有建都朝代与建都时间均集中于唐末以前。这正是古都西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色所在。正因为建都历史悠久绵长,文化遗存丰厚,才使得古都西安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不同凡响,其独特的古都风貌不仅颇为古今中外的文人、游客所称道,而且构成了当代西安的城市文脉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

## 二 古都西安历史发展中的六种城市更新模式

关于城市更新,以往城市建筑学界常将其与城市改造、旧区更新、旧区改建、城市再开发、城市复兴、旧城整治等概念完全等同视之。但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更新不能仅仅局限于危旧房改造、基础设施完善或旧区改建,还应该包括城市结构的更新、功能体系的重构等多方面的内容<sup>②</sup>,必须着眼于区域的整体发展,着眼于城市的整体更新<sup>③</sup>,也就是说应当将城市更新的涵义理解为城市的区域和内涵上的结构性调整和演替,是城市功能体系上的重构与重建这一过程<sup>④</sup>。这样的理解,不仅比较切合我国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而且也与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和郊区化发展趋势相吻合。城市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过程,因而从历史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更新问题是一个饶有意义的课题。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处理旧城与新城的关系,或者说是如何选择城市的发展模式。据有些学者研究,从中外城市发展的情况来看,城市更新过程中对旧城与新城关系的处理主要有新城围绕旧城发展,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旧城和新城完全脱开等类型<sup>⑤</sup>。但从古都西安城市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分析,不仅上述城市更新模式都曾出现过,而且还采用过缩小旧城规模、拓展旧城规模和因袭旧城改造更新这三种城市更新模式。其中在都城发展期和西北重镇发展期均出现了多种城市更新模式。兹分别简述如下:

### 1 旧城和新城脱开类型(新旧分制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主要是西周丰京、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公元前 1059 年周文王自岐下(即周原)徙都丰京(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沣水西岸),开创了西安城市发展史的新阶段。秦人继周而起,其都城曾几经迁徙,有所谓九都八迁之说,即非子都秦(今甘肃张家川县),庄公徙西犬丘(今甘肃礼县),襄公徙汧(今陕西陇县),文公徙汧渭之会(今陕西宝鸡市东),宪公徙

① 朱士光:《西安建都朝代新论》,载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 年。

② 耿宏兵:《90 年代我国大城市旧城更新若干特征浅析》,《城市规划》1999 年第 7 期。

③ 吴炳怀:《区域、城市整体发展与旧城功能、用地结构的调整》,《城市规划》1998 年第 1 期。

④ 于涛方、彭震、方澜:《从城市地理学角度论国外城市更新过程》,《人文地理》2001 年第 3 期。

⑤ 阳建强、吴明伟:《现代城市更新》,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5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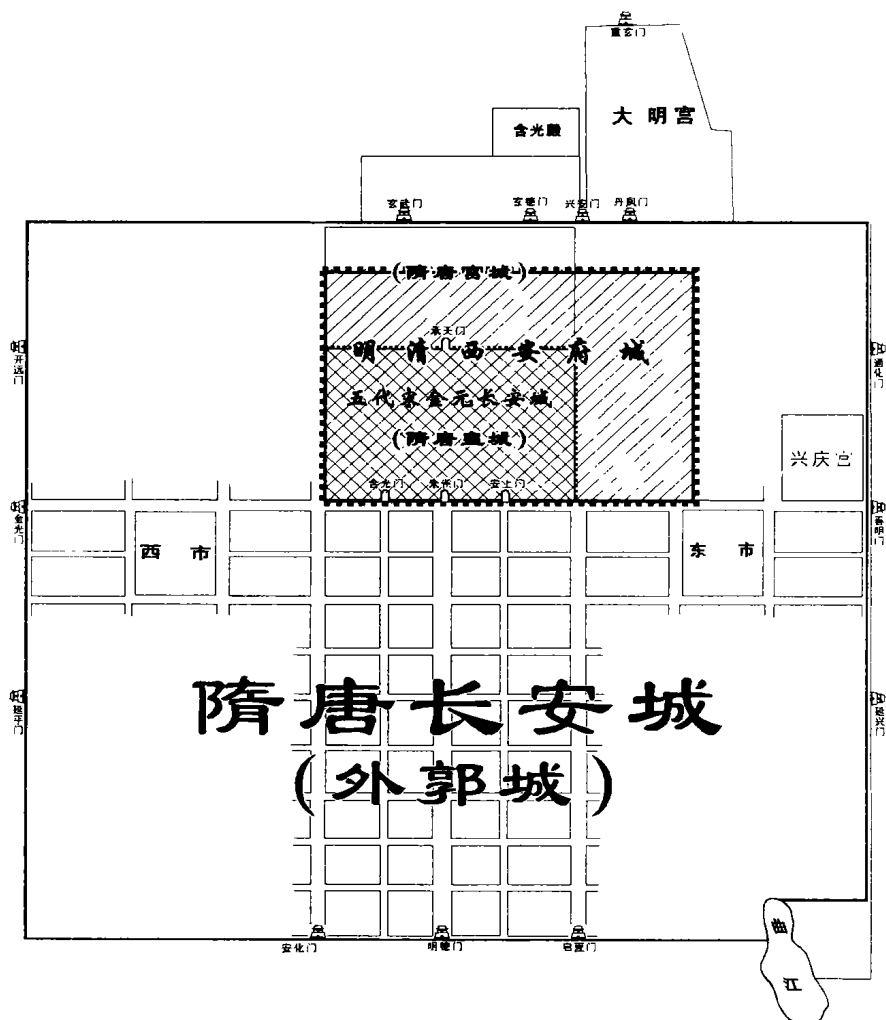


图2 隋唐长安城、五代宋金元长安城、明清西安府城城区范围图

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德公徙雍(今陕西凤翔县),灵公徙泾阳(今陕西泾阳),献公徙栎阳(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孝公徙咸阳(今陕西咸阳市)<sup>①</sup>。自秦孝公以来,秦人一直以咸阳为都,咸阳邻近西安,两市仅隔一渭水,经济文化自古联系紧密,故今人习惯上也将其视为西安建都史的一个部分。周人与秦人的历次迁徙都城,都是区域间的城址迁移,但新都(新城)继承了旧都(旧城)的腹地,在地理空间上仍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从广义上说仍可算是城市的更新,其城市更新模式应属于具有特殊性的旧城和新城脱开的城市更新类型。西汉初年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位于渭水南岸,系因龙首山以为新都,而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于龙首山南麓另起大兴城,就城市在空间布局上迁移的特征而言,属于城市在原位置基础上渐渐向新的

① 李自智:《秦九都八迁的路线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辑。

生长点挪动,新城区与旧城区连成一片,新城区兴起的同时,旧城区随之衰落<sup>①</sup>,是典型的现代区域地理学上所说的城市“蠕移”类型<sup>②</sup>,但若从城市更新的角度来看,则属于是典型的脱开旧城另建新城(新旧分制)的模式

2 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西周镐京和民国中后期的西安城。周武王灭商后所营建的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沣水东岸),与旧都丰京仅隔一沣水。镐京建成后,丰京并未完全废弃,两城形成双城结构形态,但新城是在旧城的东面新发展起来的,其政治中心作用明显超过旧城。这是典型的新城在旧城一侧发展的类型。民国中后期,亦即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安以及抗战爆发后移民的大量涌入和东部沿海地区工厂的内迁,尤其是为适应陪都西京建设的需要,西安城的北郊、东郊和西郊,特别是东北郊的火车站附近和东关城外的新市区都相继发展起来。旧城虽然仍是全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但由于城郊新市区的发展,城市建成区突破了旧城的束缚,城市的外部形态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初步奠定了现代西安城市形态布局的基础。这应属于典型的新城在旧城几侧同时发展的城市更新类型。

3 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解放后的西安城。西安城1949年解放后,在民国旧西安城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由于当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50年代初的城市规划设计比较强调对旧有基础的依赖,所以采取了以旧城为中心,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的城市更新模式。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城市的行政中心与民国时期一样仍然在明城以内,但旧城四郊的新城区扩展很快,尤以东、西、南三面城区扩展为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西安城的外部形态已由改革开放前的“T”字形形态逐渐发展成为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迅速扩展并在外围形成若干城镇组团的超级大城市。

4 缩小旧城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唐末韩建改筑的长安城。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迁都洛阳以后,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而且由于人为的破坏,宫室官署与居民庐舍毁拆殆尽,城市人口也大量减少。为了便于军事防守,驻防长安城的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韩建对长安城进行了改筑,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记其事云:“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原注: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这个“新城”只沿用了唐长安旧城中的皇城城垣,较旧城规模大大缩小。但是韩建在改筑新城时,不仅对城门有所调整,而且在新城之内又新筑有一个子城(衙城),使新城仍为传统的重城结构,并且在新城的東西两侧又各建一个小城作为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与新改筑的京兆府城一道形成独特的母子城结构形态<sup>③</sup>。可见韩建改筑新城不是仅仅缩小了旧城的城垣,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城市内部空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造,应属于比较特殊的城市更新类型。这种城市更新类型在现当代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很少遇到,但在历史上却并不罕见。

① 需要指出的是,隋大兴城兴起后虽然汉长安城随之衰落,但仍是整个都城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长安被纳入大兴城北皇家苑囿之中,既有军事防御的功能,同时亦是皇家一个重要的游乐场所,直到唐时仍复如此。

② 胡兆量主编:《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③ 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

## 5 拓展旧城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明代的西安城。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西安旧城墙,是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1378年)间修建的。明初修筑西安城时,除西、南两面因用韩建“新城”即后来的宋金元长安城以外,北、东两面均向外扩展了约四分之一。这种在旧城基础上,在其一面或几面拓展新城区的城市更新方式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比较多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西安城因为在城中的东北隅又新建有一个“城周九里,门五”,外形呈东西窄、南北长,并有砖城(王城)和萧墙两重城垣的秦王府城,从而使新建的西安城呈现出具有三重城墙的重城形态<sup>①</sup>。

## 6 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长安城、唐长安城、五代宋金元时期的京兆府城(长安城)、清代的西安城和民国初年的西安城。各朝代稳定发展期内的城市更新也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改朝换代之际,往往是城市更新比较明显的时期,即使城址和城垣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城市内部的更新也会时有发生。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定都长安,因用的是西汉长安城的旧基。北朝时期的前秦和后秦也是如此。唐长安城因用的是隋大兴城的旧基。五代宋金元时期的京兆府城因用的是唐末韩建改筑的“新城”。清代的西安城因用的是明初修筑的西安城。上述各朝代的城址都因用了前朝的城市旧基,但并非一味因袭,没有任何建树。其实城市的更新应该说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一直进行着,只是有时表现为剧烈的城市迁建、改建,有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更新改造。按诸史实,上述各时期西安城(长安城)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城市更新的举措。如十六国时期长安城中就分有小城,北朝时期长安城中又另有小城、子城和皇城<sup>②</sup>。唐朝前期在长安城东北隅和城东分别另建大明宫城和兴庆宫城,与大内太极宫共同构成北、东、西“三大内”,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宋金元时期的京兆府城虽因唐末五代之旧城,但城门、街道、市场、居民区都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sup>③</sup>。清代西安城虽因用明西安城,但城内东北部和东南隅又新筑有驻扎八旗兵甲的满城和驻守汉军的南城<sup>④</sup>,城市形态与明时已不尽一样。民国初年拆除满城后发展起来的所谓新市区,更是典型的城市内部更新过程。至于各朝代稳定发展期内,随政治需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内部必定也处于经常性的更新状态,有时甚至有比较大的城市更新动作,如西汉武帝时期在长安城西新筑建章宫城,西汉末年王莽在长安城南新筑九庙、太学和辟雍,后秦在长安城北开辟逍遥园,明末西安城东西南北四个关城之兴建等等,都曾对当时的城市形态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古都西安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更新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规律和特点:

(1)在古都西安长达 3000 多年的城建史中,城市更新始终贯穿于城市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无论是在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以前的都城发展期,还是其后的西北重镇发展期,在其各个重要的城市发展阶段中,都有相应的城市更新过程与之相伴。可以说正是通过不断的城市更新,这一千年古都才得以不断延续,不断发展。

① 吴宏岐、党安荣:《关于明代西安秦王府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②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③ 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

④ 吴宏岐、史红帅:《关于清代西安城内满城和南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

表 1 古都西安历史上的城市更新模式

城市更新类型	新城名目
旧城和新城脱开类型 (新旧分制类型)	(1)西周丰京 (2)秦都咸阳 (3)西汉长安城 (4)隋大兴城
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	(1)西周镐京 (2)民国中后期的西安城
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	(1)解放后的西安城
缩小旧城类型	(1)唐末韩建改筑的长安城
拓展旧城类型	(1)明代的西安城
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	(1)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长安城 (2)唐长安城 (3)五代宋金元时期的京兆府城 (4)清代的西安城 (5)民国初年的西安城 (6)稳定发展时期的各城

(2)古都西安城市更新过程中先后出现过旧城和新城脱开类型(新旧分制类型)、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缩小旧城类型、拓展旧城类型和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等六种城市更新模式,这要比当代城市学者根据国内外城市更新现状所总结的城市更新模式复杂一些。当然古都西安建城史较长,城市规模、性质、地位几经变化,所以会出现较多的城市更新模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都西安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但其他类型的城市未必如此,可能城市更新模式要少一些,也可能会出现其他城市更新模式,不可一概而论。

(3)城市更新模式的选择都是与当时城市发展的需要相关联的。就古都西安的城市更新历史而言,旧城和新城脱开类型(新旧分制类型)一般出现在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以前的都城发展期,尤其是强盛王朝兴起之际;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和拓展旧城类型一般出现在城市发展较快的时期;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一般出现在各朝代中后期的城市稳定发展期;缩小旧城类型往往出现于城市发展萎缩时期。虽然从城市发展整个历史过程来说,古都西安的发展可大致分为都城发展期和西北重镇发展期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因为都在都城发展期中西安也有都城等级下降或不作都城的阶段,而在西北重镇发展期中西安也有发展相对较快的阶段,所以不少城市更新模式在上述两个大的时期内都曾出现过。

### 三 抗战时期的三套城市更新方案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为了抗日战争和开发大西北的需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曾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开始进行陪都的设

计与建设工作。后来,为了便于实际运作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西京筹备委员会”还与陕西省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合组成立了“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在陪都西京建设期间,先后有三种陪都西京规划方案问世,对当时城市更新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思考与研究

1934年2月,民间学者季平在其《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一文中,根据英、美、日等先进国家都市分划制度之法令实例,并结合自己对西安城市发展状况的“实地之考察”,提出了西京市区的选定首先应注意“交通之便利”、“给水之便利”、“排泄之便利”、“天灾之防避”和“有扩展之余地”五个要点,并提出了市区之分划更应注意的九项原则。在此基础上,他对西京市的城市功能分区也提出了一整套的意见:

关于商业、工业区,季平认为“如不假人力之节制,听其自由发展,即将来之商、工业中心,似以现在车站迤东铁道线南北两方,最有可能”,但“现车站迤东地带,局促窄狭,既不足供整个市区之应用,复有人谓东北一带为西安最频风之上方,颇不适于工场之建筑”,所以“如舍此而另谋相当之地点”,“旧汉城一带,实最适于商场之建筑。汉城以西,自三桥镇西进,夹于铁道线与渭河中间带地区,宜为工业之中心。”

关于文化风景区,季平认为“产霸两水之滨,柔丽轻倩,韦、杜二曲之际,深秀雄伟,在在足为园林游观之建置,高尚性格之陶冶。曲江、樊川之盛,既有前例,山水风物之美,无须他求矣。故城郊一带,高等教育机关之设置,幽居、别业之创建,自为适当地点。”

关于行政区,季平认为“若夫一市总枢之市政府在理应位于市中心地带而以应附之局所附丽之,以成其为小小之政治区域。然西京既曰陪都,将来有关政治建筑自不在少数。如须另寻适当场所,则西关迤西现崇仁寺一带,定为行政区域亦自堂皇。使将来铁道线南之商业区果须增辟者,此亦正为全市之中心焉”<sup>①</sup>。

上述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方案,是目前所见有关西安的最早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方案。这个城市规划方案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一是借鉴国外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首次将西京(西安)市划分为商业区、工业区、文化风景区和行政区;二是在具体的城市功能分区中,充分考虑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山川地形状况和天气气候特点;三是颇具前瞻性,新市区的规划完全摆脱了旧西安城区的束缚,将新市区规划在旧城区之西北、西部和南部,这也是季平方案最值得称道之处,因为中国近50多年的城市规划实践证明,“脱开旧城建新城”,对于历史悠久、文物遗存丰厚的城市而言,是最为理想的模式<sup>②</sup>。当然这个城市规划方案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是未充分考虑西安的历史文化名城特点与古迹文物保护的需要,甚至于将未来的西京商业区规划在西安城西北的旧汉城遗址一带。正因如此,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方案后来基本上未被西京筹备委员会采用。

西京筹备委员会与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正式的西京都市规划研制工作,一直到1937年才开始启动,当年3月召开了“西京市区计划第一次会议”,首次确定了陪都西京的分区方针。约4年后,即在1941年先后推出了两套西京城市分区方案,这就是《西京规划》和《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分别提出的西京分区计划。

① 季平:《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载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4~88页。

② 朱兆雄:《脱开旧城建新城——洛阳模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编:《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商务印书馆,1999。



在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的《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一书之第 97 至 150 页,收录有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与西京筹备委员会的有关专家共同编写的《西京规划》。《西京规划》共 4 万多字,全文共分四章,其中第一、二章分别为《西京沿革》和《市区观况》,系对西京历史政区沿革和当时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调研资料汇编;第三章为《计划区域》,是对当时西京市行政区划的拟案;第四章为《分区使用》,篇幅不长,但却是整个是《西京规划》的重点所在

表 2 抗战时期三套西京市分区方案比较表

提出者	分区数目	分区名目	分区地域	其它说明	资料来源
季 平	4	商业区 工业区  文化风景区  行政区	旧汉城一带 汉城以西,自三桥镇西进,夹于铁道线与渭河中间带地区  (城东)产、灞两水之滨,(城南)韦、杜二曲之际 西关迤西崇仁寺一带	文化区与风景区重迭	《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
西 京 市 政 建 设 委 员 会 龚洪源	6	行政区 商业区 工业区 农业实验区 古迹文化区  风景区	省城之北龙首原古汉城东隅 西安省城 西安车站路一带 西京市南郊神禾原、子午镇一带 省城西北、北、西、西南、东南之“历代古迹之所在”地区 西京市南郊终南山	国府五院各部会设在“行政区之中心地点”,市政府则“设在城内商业区中心地点”,而“各国公使馆暂不设立,俟将来国府奠定后,再行指定地点”	《西 京 规 划》第四章《分 区 使 用》
西 京 筹 备 委 员 会	6	文化古迹区  行政区 商业区 工业区 农业区 风景区	省城西北、西、北、东南之“历史代文化所在”地区 西安城南凤栖原 西京旧城及城东 车站之北郊 西京南郊神禾原、子午镇一带 西京市南郊终南山		《西京市分 区 计 划 说 明》

由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技正龚洪源草拟的《西京规划》中的第四章《分区使用》,是官方提出的第一套比较系统的有关西京市区分区计划的方案,这个方案虽然比民间学者季平在 1934 年 2 月提出的西京市分区方案晚了 7 年多时间,但却比后者更为完善一些

与季平方案相比较,代表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意见的龚洪源方案的特点有:一是根据西京地区管辖有大片农田和城南终南山风景优美的特点,分别将其划定为农业实验区和风景区;二是考虑到西安古迹遗存众多的特点,以范围更广的古迹文化区取代了季平所划的文化风景区;三是充分考虑西安城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将旧城区辟为商业区。当然,龚洪源方案也有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城市规模设计过大,并且在行政区的处理上不够妥当,其分区方案将行政区安排在省城之北龙首原古汉城东隅,距离已划为古迹文化区的古汉城过近,没有多少发展前景,而同时又设计将官署势将日益增多的西京市政府安排在“城内商业区中心地点”,又似乎

与其脱离旧城另行规划行政区的主旨产生了矛盾(参表 2)。另外,这个方案只提到国府五院各部会设在“行政区之中心地点”,而“各国公使馆暂不设立,俟将来国府奠定后,再行指定地点”,至于将省政府安排在什么地点,则未曾说明,显示出其不够严密。正因有这样的缺憾,龚洪源方案中关于行政区的处理方案并未被当时的同行所认可。

在《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一书之第 93 至 95 页,收录有一份《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是以西京筹备委员会名义发布的正式分区计划方案,文档时间不详,但从相关语句的判读可知,正式公布的时间大致也在 1941 年或稍晚。

西京筹备委员会的《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开篇即揭明自己的分区依据:“查西京市区域南以终南为屏障,北有渭河之濒绕,西有沔皂之襟带,东有产霸之雄抱,集崇山峻岭、高原平川于一地,而为历代首都者达一千七百余年,气象雄深,殆非其他都会所能及。本会爰就山河形势及名胜古迹之所在,划分为六区”。其所划分西京各功能区的数目与名称大致与《西京规划》略同,即亦是将整个西京市区分为文化古迹区、行政区、商业区、工业区、农业区和风景区这六个区并绘制有相应的分区图,但在整体规划安排上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如果与《西京规划》中的分区方案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的分区计划,在依托本区“山河形势及名胜古迹”条件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到西京城市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发展需求,设计周密,论证严谨,因而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除此之外,在具体的分区计划中,也有以下几点颇值称道:

一是将文化古迹区的划分放在整个分区规划首要位置,即将省城西北十余里之汉城及其以西的太液池、阿房宫、镐池、昆明池等,城北唐代之含元殿及其南一里的丹凤门(丹凤公园),城之东南八里大雁塔、唐曲江池等,均划为文化古迹区,要求“妥为保存,以留古迹,并栽种树木,加以整理,以增厚游览兴趣”。显示出本方案对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特色以及这个城市旅游业发展前景的重视;

二是行政区的安排作了较大的调整,即在西安城南凤栖原规划行政区,“建设各级官署”。前已述及,《西京规划》第四章《分区使用》的西京分区方案是将行政区设在省城之北龙首原古汉城东隅,以安排“国府五院各部会”,同时又将西京市政府安排在“城内商业区中心地点”,而“各国公使馆暂不设立,俟将来国府奠定后,再行指定地点”,省政府则未曾言及,这既有摊子铺得过大之嫌,又不够科学周密。而《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在行政区的设置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以西安城南凤栖原,充分吸收了民间学者季平抛开旧城另行规划行政区的思想。这个行政区规划方案继承了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城市规划手法,利用山川地形特点以突出行政区,并以行政区为中心进行城市平面布局,这样既比较完善地解决新旧城的矛盾,又使整个城市规划凸现出宏伟壮观,气势磅礴。

三是利用西安旧城的已有商业基础布设商业区,并在预测自陇海铁路通达后,西安城的商业中心可能要向城东转移的趋势后,提出在将西安旧城规划为商业区的同时,“并将城之东部扩充,以备商业发展之需要”。这比《西京规划》既将西安省城规划商业,又拟在旧城内安排西京市政府机关的设计方案,要更科学合理一些。

当然,《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也的不足之处,主要是与《西京规划》一样,未充分考虑西京市作为西北地区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未来的陪都所应发挥的文化教育功能,没有象季平方案那样,在整体城市分区规划中设计出专门的文化区。

总之,从整体上来看,民间学者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方案、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西京规划》与西京筹备委员会《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所提出的西京市分区规划方案,均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方案,这三套西京市分区方案的具体内容虽然多有不同,但重视西安的古都特色和文物古迹保护,提倡陪都西京城市规划中应该新城与旧城的城市功能分开即实行新旧分制则是其共同之处,可惜因不久国民党当局取消了西京陪都计划,这一新旧分制的城市更新思路并未能付诸实施。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和偏见,上述城市规划方案在西安解放后也均未引起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部门的足够重视<sup>①</sup>。

## 四 新旧分制:新世纪西安城市更新的基本战略

通过上述对古都西安城市更新历史过程与历史上城市更新模式选择的回顾与总结,以及抗战期间三套城市更新规划方案的比较研究,可对现阶段西安更新的基本思路略作思考。

西安解放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西安被列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1953年,李富春、万里同志率领工作组来西安,结合国家“一·五”期间“141项重点建设项目”的选址,与西安市的城市规划人员一道,于1954年完成了《西安市1953年到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这个总体规划确定距旧城区东、西各四里的地区为工业区。生活居住区主要分布于旧城外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工业区与居住区之间设置防护林带。陇海铁路以北作为仓库区和铁路职工住宅区;考虑到汉长安城和大明宫遗址的保护,陇海铁路穿越城市等因素,铁路北不作大的扩建。南郊为文教区,以旧城为中心从三个方向向外发展<sup>②</sup>。这个西安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虽然不乏其合理的一面,但由于当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比较强调对旧有基础的依赖,所以采取了以旧城为中心,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的城市更新模式。这一城市更新模式的选择固然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城市发展的迫切需要有关,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古都西安在新时期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但在取得一系列城市建设成就的同时,其弊端也日益显露,主要是随着城市基础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历史文物古迹、遗址不断受到破坏,不仅严重损害了西安城的古都风貌,而且导致城市中心负荷过重,引起了旧城区交通条件恶化、居住环境建设进展缓慢等一系列城市问题<sup>③</sup>。虽然1978年西安市在总结过去二十余年城市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制订的《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已明确提出“旧城区为保护改造区,对古城墙及历史文物、遗址、有价值的街坊加以保护、修整”<sup>④</sup>,并且后来也在旧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修整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与洛阳、大理等脱开旧城另建新城的城市相比较,西安旧城内的旧有风貌基本上已面目全非。近年来,随着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西安作为西北地区首位中心城市的城市职能加强,如何解决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

① 另参吴宏岐:《抗战时期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及其对西安城市建设的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郭文毅、吴宏岐:《抗战时期陪都西京3种规划方案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5期;吴宏岐、阎希娟:《抗战时期陪都西京筹备计划与西京市区分区方案》,载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新世纪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西安市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2页。

③ 程安东主编:《内陆外向型城市——西安发展战略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2~591页。

④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西安市地理志》第458页。

日益加剧的矛盾,就成了摆在城市规划工作者的一大难题。

应该指出的是,其实在解放初期,对于古都西安的城市更新而言,是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的。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西周丰京、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都采取了旧城和新城脱开即新旧分制的城市更新模式。唐长安城虽然采取的是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但隋大兴城设计规模宏伟,气度非凡,又经营未久,是与唐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和长安本身的城市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抗战期间,为了配合陪都西京的城市建设,民间学者和官方均提出过新旧分制的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是其中合理的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思想应当是可资借鉴的。从全国范围来讲,当时河南的洛阳、云南的大理、陕西韩城等历史文化名城都采取了新城脱开旧城的发展模式,不仅城市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且古城风貌基本上完整保留。在国外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参考借鉴的。如意大利的罗马、锡耶纳、佛罗伦萨、威尼斯、比利时的布鲁日等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实践经验。罗马城完整的古都风貌不仅使其得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与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楷模。锡耶纳城是一座堪称欧洲哥特文化中心的城市,至今仍保持着中世纪的城市格局,整个城市几乎未经触动完整地保留下来。自20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北美各国大多数城市都把注意力放在道路、汽车、飞机场和飞机上,而锡耶纳则始终把大教堂和城墙看作城市的骄傲,尽力控制交通,让汽车交通基本上隔绝在城外,使古城免受汽车的侵害。市政当局在重新翻修路面时恢复了中世纪的面貌,让人们一踏进城市就可以享受中世纪古城的情趣,同时还致力于在城内提供就业和住房,设法吸引人们住在城内。多年来,尽管城市和建筑空间在变化,建筑的外观也在变,但与城市格局和整体结构相比只是一种几乎感觉不到的微小变化<sup>①</sup>。然而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建国后西安并没有选择新旧分制的道路,而是与首都北京等诸多城市一样,选择了以旧城区为中心的一元化单中心发展模式,即所谓“新旧混合”或“摊大饼”模式,才形成了城市发展与古都风貌保护的矛盾日益加剧的客观现实。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与保护是城市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之一,通过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以振兴古城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国外学术界对如何保护古城也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物质到精神的发展过程。20世纪初到30年代为单纯保护阶段,以立法保护为主,保护重点是古建筑古遗迹;从30年代到70年代为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阶段,对保护与利用结合作了种种试验和探索,保护范围已扩大到建筑群、风景区以至传统街区;从70年代到现在进入了保护和延续古城风貌阶段,现在国际上已形成了一整套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方法,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整个历史古城<sup>②</sup>。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国外有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在自发形成了“新旧混合”的模式后,当城市进一步发展时,转型为“新旧分制”模式,法国巴黎是其成功之例。在汲取了“新旧混合”的模式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后,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在进入80年代城市快速发展时期时就陆续采取了古城之外另辟新区的城市发展模式,为古城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1986年苏州开始实施“古城——新区”二元规划布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苏州古城内的人口已减少十多万,古城、新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古城以居住、文化教育、传统工商业和旅游事业为主,新区以经济贸易、现代工业为主,这样既使

① 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② 张锦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载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新世纪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古城风貌得以保持和延缓,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两者相得益彰<sup>①</sup>。

古都风貌是西安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新时期古都西安城市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是城市特色、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最近已有学者指出,从长远来看,21世纪的前50年,应将西安旧城整体保护,恢复古城风貌,使西安在历史街区保护和利用上与世界古都匹配。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确立“新旧分制”的规划模式,在21世纪上半叶,保护和控制旧城,在南郊和北郊建设新城,这个部署,在国务院批准的西安跨世纪规划中已经体现,还有必要通过地方法规以保证其实施<sup>②</sup>。上世纪末西安市第三次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中心城市是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中最主要的区域,它是由中心市区和外围十一个组团共同构成的。中心市区旧城区是文物古迹遗存较多的区域,是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商贸、文化中心。由于旧城区所承担的城市功能极为重要和多样性,而导致了旧城区中地价不断上涨;开发者被利益所驱动,均想在单位面积上争取最大的回报,所以对旧区的破坏极大,旧城区中出现了各式高、大的建筑,与名城的风貌格格不入;同时旧城区的位置居中,商贸、文化、医院等各种市政、公益和服务设施完善,也是人们不断“盘居”在旧城的一个理由。目前,旧城区居住人口已达40多万,居住密度远远超过国家标准。这不仅给旧城区的文物保护带来的压力,而且使人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减少旧城密度,降低高度,调整旧城功能以及避免旧城内的大规模拆建已成为关注的焦点。可见,近几年的名城保护(特别是旧城区)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实施新旧分制的城市更新思路已是西安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必由之路<sup>③</sup>。

现当代的西安城虽已失去了首都之地位,但在西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地位将越来越得到加强。所以新世纪现代化新城市的规划建设一开始的起点就要高一些,要选择较具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模式并据以制定相应的城市发展规划。客观的说,新旧分制的城市更新模式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当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不仅是单纯从保护古都风貌的角度来考虑,从西安作为西北地区首位城市的客观发展需要上来考虑也应是如此。未来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应该着眼于城市整体的更新而对各个城市功能区进行重新调整,新旧分制就相应地成为的新世纪城市更新的基本战略。这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西安旧城区(明城区)的保护与改造,应该与其功能的重新调整联系在一起,应当放在整个西安市区城市更新中来考虑。根据古都西安的保护与发展现状,旧城区应适度限制发展规模和速度,在以保护为主的前提下采取稳步的城市改造方针;旧城区应以发展商业与旅游业为主,省、市两级行政职能均应逐步向新城区转移;新城区的发展规划应根据城市的发展需要及时地进行调整,可考虑借鉴西安历史上的城市更新经验和国内外城市更新的成熟作法,在城南、城北选择理想的区位建设若干副都心,形成新的城市行政中心和中心商务区(CBD)以缓和旧城区的压力,并促成西安各城市区的均衡发展,形成全新的“大西安”城市发展格局,使古都西安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① 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② 韩骥:《从世界五大古都看西安古都未来的保护与发展》,载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新世纪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杨明瑞:《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城市新旧分制的发展格局》,载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新世纪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 **1. Carrying on the Good Traditions of the 'Yu Gong' Institute and Pushing Furth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by Zhu Shiguang)**

As the chief founder of moder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Mr. Gu Jiegang has passionate feelings for our country, conscientious attitude towards studying and pioneering vision on science. These best qualities are enough worthy of us learning forever.

### **2. The Red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Gistorical Geography (by Michael Williams)**

This paper has three parts. The first examaines the emergenc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distinct subset of the history discipline. Its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 beginning with its roots in North American conservation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ts evolving ethical and radical emphasis, and ultimately its more internationalist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s of humans in nature. The various models (mainly anthropological) and agendas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re examined. The second part considers the contribution of primaril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eographers to the larger human/nature debate raised by environmental history.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four areas of study (1) the transfom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earth (2) global expansion and the capitalist economy. (3) the place of humans in naturd and. (4)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habitat,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third part surveys some of the implications, commona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iscourse for both disciplines. It is concluded that both disciplines have much to contribu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the telling of place stories".

### **3. Study on Renewing Patterns in History and Renewing Strategies in the New Century of Xi án (by Wu Hongqi, Yan Yan)**

By brief retrosp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Xi án, authors analyzed main renewing patterns of Xi án from it founded at 3000 years ago. At the same time, they thought that there were six renewing pattern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 án. These patterns are new district broken away from, lay in one lateral or several laterals of and developed around the old one, shrinking, expanding and following the range of the old on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contrasted three renewing patterns in Anti- Japan War and come up with that new district broken away from the old one should be the primary strategy in renewal of Xi án in the new century.

### **4. The Traffic and Intercourse between Chang' an and Nanhai States In West Han Dynasty (by Zhou Weizhou)**